

## 频率首要地位的非绝对性 ——再论汉语国际教育词汇大纲设计标准

马清华 \*

(南京大学文学院, 中国)

**提要:** 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大纲的设计标准因目标不同而异。同一目标下, 标准又常不止一项, 多项标准间有时兼容, 有时冲突。本文通过剖析和评价新的汉语水平考试(HSK)词汇大纲的是非得失, 揭示了词汇大纲设计过程中, 任务目标、指标条件、处理策略间的互动, 以及众指标特征间的互动关系, 从中抽象出一般原理和总体规律。研究结果颠覆了频率指标地位居首这一至少是流行在中国学界的惯常认识, 发现频率指标的首要地位只存在于指标兼容模式。在言内指标的冲突模式里, 语体指标、句法指标是强势指标, 词频指标退居弱势; 在言内外指标的冲突模式里, 言外指标是强势指标, 言内指标退居弱势, 表明语言不可能凌驾于它的使用目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大纲的完善, 对完善汉语国际教育乃至整个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词汇大纲, 设计指标, 兼容, 冲突, 动态作用准则, 优选

### 1. 引言

在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大纲的设计中, 频率标准处于何种地位? 中国对外汉语学界在本世纪初还普遍认为, 频率几乎是词汇大纲择词时的唯一依据。赵金铭等(2003)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该文说:“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其性质决定了其编制必须以词语的使用频度为原则, 用使用频度来衡量词语的常用程度, 以进行词语筛选和确定词语的等级。”马清华(2008)详文分析了中国1992年制订、沿用近二十年的旧 HSK 词汇大纲的种种不足, 论证了唯频率标准的不自足性, 从而驳斥了把频率作为大纲单一择词标准的观点和做法, 但仍然相信频率作为最重要标准的地位。因此, 中国学界最新的观点也只认为: 频率标准不是唯一的, 却是最重要的。

本文拟通过分析, 进一步证明: 频率未必总是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大纲设计中的最

---

\* 马清华: 博士,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语义学和语法学。著有:《系统原理下的语言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语义的多维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年);《并列结构的自组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文化语义学》(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复综语:形态复杂的极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句法语义论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E-mail: maqh86@nju.edu.cn.

重要标准,有时恰恰反而是弱势指标。论文根据系统运筹观,在马清华(2008)和剖析新 HSK 词汇大纲是非得失的基础上,论证任务目标、指标条件、处理策略间的互动,以及众指标特征间的互动关系,抽象出一般原理和总体规律,从中发现,词汇大纲的设计指标是系统性、多层面、多项目的,多项指标在动态中发挥作用,有兼容和冲突两种模式。频率指标的首要、强势地位其实只存在于指标的兼容模式。在指标的冲突模式里,情况迥然不同:在言内指标的冲突模式里,语体指标、句法指标是强势指标,词频指标退居弱势;在言内外指标的冲突模式里,言外指标是强势指标,言内指标退居弱势,表明语言不可能凌驾于它的使用目的。结论推翻了第二语言学界关于频率地位居首的惯常认识。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对保证大纲设计质量,完善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在内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也有一定意义。

## 2. 单项指标的类型及其作用准则

一个词应否入纲,主要取决于其作用的大小,而判断其作用大小的指标是多项、多层面、系统性的。

首先,不同的目标决定了选择不同的策略。新 HSK 词汇大纲秉持着面向一般交际的最简-任务型理念,要让学员在最小难度下,以最少努力获得最大的表达能力和学习潜力,最大程度地从中获得激励(参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2010:前言))。为落实这一方针,新纲将收词规模控制在 5000 个。旧纲要实现的是语言建构任务,故此,张凯(1997)、李清华(1999)、刘长征(2007)等认为旧纲的 8822 个词汇量偏低,李清华(1999)通过多方证明,认为其合适词汇量应定在 15000 个左右。

其次,设计策略具体落实在标准的选择上。同一目标下,标准常不止一项。以下结合对新 HSK 词汇大纲是非得失的剖析,论证具体有哪些作用指标。

### 2.1 言内指标

言内指标包括语用指标、语义指标、句法指标、构词指标。

#### 2.1.1 语用指标

(1) 词频指标 当频率差异明显,而其他指标下的特征差异不明显时,大纲应优先选取高频词。以新纲对异形词的选择为例。若国家尚未出台相应标准,则高频词形应优先于低频、稀见的异形词形,但新纲未坚守该准则,所以时是时非,进退失据。第一、二批《异形词整理表》均未对“身份-身分,含义-涵义,盈利-赢利,致辞-致词”提出选择意见,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2008)《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下称《词表》)在频率排序时也往往不予分别,如“涵义/含义(第 5924 位)盈利/赢利(第 6729 位)致词/致辞(第 13207 位)”。不过,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下称“CCL 语料库”)里,“身份、含义、盈利”的频率均远超其异形词“身分、涵义、赢利”,“致辞”的频率略超“致词”,比较搜索结果:“身份(11372 例次)-身分(1751 例次)|含义(3697 例次)-涵义(770 例次)|盈利(3541 例次)-赢利(980 例次)|致辞(1113 例次)-致词(1010 例次)”。《词表》但收“身份(第 2163 位)”,未收“身分”。旧纲不予分别,一并收入大纲,显属不妥。新纲恰当保留异

形词的常见词形“身份(五丙)含义(六丁)盈利(六丁)致辞(六)”,<sup>①</sup>删除了相应的稀见词形“身分(丙)涵义(丁)赢利(丁)致词(丁)”。

但另一方面,新纲对异形词“想象-想像”的处理却不甚恰当。第一、二批《异形词整理表》均未对“想象-想像”作出取舍,但两者频率悬殊。CCL语料库里的搜索结果:“想象(11838例次)-想像(2547例次)”。可见“想象”是高频词形,“想像”是低频词形。《词表》中,“想象”频序为第1689位,“想像”未收。但旧纲不恰当地取“想像”而舍“想象”,新纲则沿用《现代汉语词典》做法,两形兼收,即不仅保留“想像(五乙)”,还增收“想象(六)”。将此异形现象引入词汇大纲,违背了其声称的最简理念,也跟对其他异形现象的处理方式形成了矛盾。

(2) 语体指标 语体指标的实质是语体自由度指标,它主要指通用语体词应优先于特殊语体词。新纲恰当地取通用语体词“惩罚(六丁)怎么(一甲)”,舍口语词“罚(丙)怎(丁)”。取通用语体词“树(三甲)时候(一甲)暂时(四乙)开始(动,二甲;名,三甲)”,舍书面词“树木(丙)时(名,丁)暂(丁)始(丁)”;取通用语体词“吃(一甲)”,舍书面词“食用(丁)”或高度文言词“食(动,丁)餐(动,丁:大~一顿)”;取通用语体词“什么(一甲)”,舍高度文言词“何(丁)”。高度书面化的文言词多分布于旧纲丁级(有的文言色彩很浓),且被新纲合理删除,又如“敌(丁,下同)|故|乃|文|尾|彼|莫|胡|终|尚|曰|复|予”。

当同义的口语色彩词和书面色彩词须二者选一时,如何抉择呢?从一般功能判定,口语词应优先于书面语词,因为口语色彩很浓的词偶可自由表达书面语承载的内容,反之则不然。俞敏用口语写语言学论著,多受赞许,陈满华(1995)专文赞其为“幽默风趣,独树一帜(帜)”,但书面色彩很浓的词通常只能包裹在碎片化的语域内进入口语(如定中标记“之”在熟语化的名称里进入口语),否则显得怪异,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即为笑料。难怪有学者说,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W.拉波夫1979)。如新纲取高度口语词“啥(六丁)”,舍高度文言词“何(丁)”。不过,由于都是非通用语体词,选用书面语词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上获得的收益,也能大致抵消删除高度口语词所带来的损失,因而选择口语词的合理性并不那么显著。

(3) 地域通用指标 地域通用指标是指共同语词应优先于方言词(例见§3.1(5))。

2.1.2 语义指标 语义指标下,基本层次概念(basic level category)<sup>②</sup>应优先于非基本层次概念;个体概念词应优先于集合概念词,因为前者可替用后者,后者却未必能替用前者;语义范围大、可笼统表达的词常优先于语义范围小、需多词协作进行表达的专义词。

新纲恰当地取基本层次概念及个体概念词“树(三甲)|花(三甲)|鱼(二甲)|米(三乙)”,删相应的非基本层次概念词“柏树(丙)果树(丙)柳树(丙)松树(丙)槐树(丁)桑树(丁)杨树

<sup>①</sup> 为便于比较新旧纲异同,沿用马清华(2010)体例,“(一)-(六)”表新纲词汇等级,“甲-丁”表旧纲词汇等级,下同。

<sup>②</sup> 基本层次概念是最常提及的概念分类层级,心理上最显著,可能也是儿童最早学到的分类单位。概念倾向于围绕着基本层次概念分等级地组织起来,后者表明最经济的分割,它们最有用,适用于大多数场合,其名称是基本类名或自然类名,形式上以基本词位命名。(马清华2000:27)

(丁)榆树(丁)“鲜花(乙)梅花(丙)菊花(丁)葵花(丁)兰花(丁)桃花(丁)荷花(丁)樱花(丁)“鲸鱼(丙)金鱼(丙)“大米(乙)小米(丁)”和集合概念词“树林(乙)“花朵(丙)”。同类情况又如“菜、茶”与其下位词的取舍(见 §3.1(2))。

但另一方面,新纲不恰当地舍基本层次概念及个体概念词“虫子(乙)“山(甲)”,反而取相应非基本层次的、集合概念词“昆虫(丙)“山脉(乙)”;舍基本层次概念词“风(甲)“瓜(丙)“油(乙)”,反而取其相应的非基本层次概念词“风暴(丁)台风(丁)“西瓜(乙)黄瓜(乙)“汽油(乙)石油(乙)柴油(丁)。“饭”“米饭”的取舍类此(参 §3.1(2))。

语义指标下的处理失当,可导致核心概念的语义缺空,造成表达障碍。如,新纲虽合理兼收了“汉语(甲)-中文(甲)”,却不当删除了其上位概念的“外语(甲)-外文(甲)”,导致被一并舍除的以下概念无法得到笼统的表达:“英语(甲)-英文(甲)|法语(甲)-法文(甲)|日语(甲)-日文(甲)|阿拉伯语(乙)-阿拉伯文(乙)|德语(乙)-德文(乙)|俄语(丙)-俄文(丙)”。牙概念词“牙(乙)牙齿(丙)”和弱程度概念词“有些(甲)有一些(丙)有点儿(乙)有一点儿(乙)”被悉数舍弃,致使核心概念牙或以弱程度概念为基础的委婉表达无法进行。

**2.1.3 句法指标** 句法指标是指一般自由词应优先于有限自由词。前者是能在相对自由的词汇句法环境下和较宽范围内使用的词(如“飞机、桌子”),后者是只能在限制性较强的词汇句法环境下和极窄范围内使用的词(如“机、桌”)(马清华2008)。有限自由词只用于单音节方位词前,或单音节的位移动词、代词、方位词后,或固定短语内,或跟其他单音节词并列与对举,或离合词的离用式,如“机、桌”只能用在单音节方位词“上、下”前,但不能用在单音节的“里、外”和双音节的“上面、下面”前,也不能自由充当宾语、中心语等句法成分。有限自由词不仅习得难度大于一般自由词,而且偏离了一般表达功能,因此即使其构词活力不低,也有理由后置处理,即使不予排除,至多只能列为高级词。

在句法指标下,新纲恰当地舍去有限自由词“案(丁:~中的关键人物|与本~无关|大学生被打一~)”,取一般自由词“案件(丁)”;舍“商(丁:共~国事)”,取“商量(乙)”;舍“商(丁:重农轻~)”,取“商业(乙)”;舍“骨(丁:~瘦如柴|钢筋铁~)”,取“骨头(乙)”;舍“惩(丁:~恶扬善)”,取“惩罚(丁)”;舍“族(丁:全国各~人民)”,取“民族(甲)”。有限自由词也多为高度书面化的文言词(参 §2.1.1(2)),诸如“埠(丁,下同)|财|偿|辞|丹|弹|殿|独|讹|额|否|腹|格|观|悔|继|界|颈|拒|帘|恋|劣|邻|岭|旅|谋|目|难|贫|腔|泉|社|世|式|视|思|寺|俗|损|坛|塘|屯|亡|畏|限|刑|旋|崖|言|液|寓|源|寨|战|症|志|置|庄|尊”等已被新纲合理删除。

**2.1.4 构词指标** 构词指标具体指构词活力(即构建大纲内其他词汇的活力)大的词应优先于构词活力小的词。这是一项词法指标。通常意义上根词最能体现能产性,因而应比非根词优先入选。构词活力可根据该词义项及大纲全部相关的同根合成词来量化计算。设x表构词活力,y为大纲内的全部构词数(包括固定短语,但不含对象词本身的数量),z为义项数,则 $x=y/z$ 。计算构词活力的材料参马清华(2010:10-140)。如

“天”在新纲和旧纲的构词活力分别是4.25(17/4)和10.75(43/4)，“天空”的构词活力在新纲和旧纲均为0。比较：

【天<sub>甲级字</sub>】①天气(一甲)天空(五丙)天文(六丙)航天(六丁)聊天(四)得天独厚(六)②今天(一甲)明天(一甲)昨天(一甲)礼拜天(五乙)成天(六丙)③天才(六丙)天堂(六丁)天伦之乐(六)④天真(五乙)天然气(六丙)天生(六丁)

新纲无视构词指标，不恰当地舍“天(甲)”，而取“天空(五丙)”。其同类不当处理又如舍“心(甲)”取“心脏(五乙)”等；舍“命(丙)”取“生命(四乙)命运(五乙)寿命(五丙)性命(六丁)”等；舍“病(名/动，甲)”取“生病(二丙)疾病(六丙)”；舍“象(乙)”而增“大象(五)”；舍“饼(丙)”取“饼干(四乙)”。相关不当处理如，舍“手(甲)”取“手表(二甲)手机(二)手套(五乙)手指(五乙)”；舍“地(甲)”取“地理(五丙)地势(六丙)地质(六丙)陆地(五丙)盆地(六丙)地震(五丙)”；舍“气(丙)”取“空气(四甲)气味(六丙)气压(六丙)氧气(六丙)”；舍“海(甲)”取“海洋(四丙)沿海(六丙)海滨(六丁)”；舍“电(甲)”取“电视(一甲)电梯(三乙)电池(五丙)电脑(一丙)电源(六丁)”。

## 2.2 言外指标

言外指标包括现实指标、心理指标、社会指标。现实指标包括现实密切度(内容现实性)、任务切合度(任务针对性)(分析见马清华 2008)。心理指标包括熟知度、联想可及度(分析见马清华 2008)。社会指标主要指语言标准化方面的社会规约(参 § 3.2(7))。

这里看内容现实性指标。在最简-任务型目的下，同义概念或专义-泛义概念只需取其一；若非日常重要概念，均可舍弃；如为日常重要概念，偶可兼收。故此，新纲恰当舍弃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已不甚重要的“热水瓶(乙)-暖水瓶(乙)”；删去重要事件相对次要环节上的概念，使大纲得到精简，如取“结婚(三乙)离婚(五乙)”，舍异形词“订婚(丙)定婚(丙)”。但所倡导的任务型理念并未得到完全贯彻，不当处理也相伴存在，如新纲没有了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春节”。

## 3. 多项指标的兼容

由于指标不止一项，同一目标下，多项标准有时协同作用，有时互相冲突。多指标协同作用时，形成兼容模式。形成兼容模式的内在基础是不同指标间往往互相关联。地域通用指标常伴随着语体指标，如方言词多为口语词。句法指标常伴随着语体差异，如句法上的有限自由词(如“敌机”的“机”)，常表现为活力的系统衰减，语体分布上也比较偏狭，限于书面。语体指标、地域通用指标的差异也常伴随着词频差异。

当候选词在其他指标下特征等势时，兼容指标的综合指数越高，优先吸收入纲的理由就越强。如果候选词在每项指标下都处于优势，则更是如此。违背这一原则，可被视为处理失当。如，旧纲词“打(甲)活(甲)跑(甲)跳(甲)爬(甲)熟(shú, 甲)睡(甲)治(乙)”等都是重要的谓词性根词，频序都较靠前，比较《词表》频序：“打(第 409 位)跑(第 528 位)活(第 675 位)治(第 1111 位)跳(第 1197 位)睡(第 1554 位)熟(第 1741 位)爬(第 2022 位)”，在新纲中的构词活力均相对较高，从高到低依序为“打 14.5(29/2)，治 4.5(9/2)，

跑 4(4/1), 活 3.2(16/5), 跳 2.5(5/2), 睡 2(2/1), 爬 2(2/1), 熟 1.3(4/3)”, 都是普通话的通用语体词。新纲却将它们悉数删除, 造成核心概念的语义空缺。

兼容模式有多项言内指标的兼容, 也有言内指标和言外指标的兼容。

### 3.1 言内指标的兼容

根据对新纲择词得失的论析, 可归出言内指标的 5 种兼容模式。在候选词里特征等势的指标, 不列入模式。兼容(协同)关系用×表示。

**(1) 构词指标×语义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 大凡构词、语义、词频、语体诸指标的综合指数高的词, 多为根词。大纲择词时, 它们一般应比同义的非根词优先。

新纲对“养、饲养、抚养”的不当取舍。(a)构词指标。“养”是基本词汇中的根词, 它在新纲中的构词活力高达 4.5(9/2), “饲养、抚养”构建他词的活力为 0, 从大纲看, 后者还有仅见于本词的孤字“饲、抚”。(b)语义指标。“养”可对“饲养、抚养”同义替换, 反之不然。(c)词频指标。“养”的词频远高于其他两词, 比较《词表》频序:“养(第 1027 位)饲养(第 5814 位)抚养(第 10402 位)”。(d)语体指标。三词均可通见于各语体, 但“养”偏口语, “饲养、抚养”偏书面。综合衡量, 在最简-任务型目的下, 当取“养”而舍“饲养、抚养”。但新纲反而取“饲养(丙)丙”、抚养(丙)丙”舍“养(乙)乙”。

**(2) 构词指标×语义指标×词频指标** 新纲对“菜、茶”概念词的恰当取舍。(a)构词指标。“菜”“茶”是根词。新纲构词活力中, “菜”为 3.5(7/2), “茶”为 4(4/1), “白菜|青菜|菠菜|油菜|芹菜”“红茶|茶叶”为 0。(b)语义指标。“菜”“茶”是基本层次概念词, 且分别是“白菜|青菜|菠菜|油菜|芹菜”“红茶|茶叶”的上位词, 并可对后者泛义替换, 反之不然。(c)词频指标。“菜、茶”频序均居首位。比较《词表》频序:“菜(第 1146 位)>油菜(第 10299 位)>白菜(第 11341 位)>青菜(第 16306 位)>菠菜(第 21219 位)>芹菜(第 24586 位)”“茶(第 2047 位)>茶叶(第 6856 位)>红茶(第 29108 位)”。新纲恰当地取“菜(甲)甲”“茶(甲)甲”, 舍“白菜(乙)青菜(丙)菠菜(丙)油菜(丁)芹菜(丁)”“红茶(乙)茶叶(丙)丙”。

新纲对“饭”的不当剔除。(a)语义指标。“饭”是基本层次概念词, “米饭、粥、面条、饺子”不是。泛义词“饭”可对以材料兼形态分类的专义词“米饭、粥、面条、饺子”进行泛义替用, 反之不然。(b)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 “饭”为 1(2/2), “米饭、粥、面条、饺子”为 0。(c)词频指标。“饭”的词频远高于后者, 比较频序:“饭(第 1491 位)>粥(第 8049 位)>饺子(第 8372 位)>面条(第 11121 位)>米饭(第 16188 位)”。显然“饭(甲)甲”应无条件留用。但新纲反倒舍“饭(甲)甲”而取“米饭(甲)甲”粥(丙)丙”面条(丙)丙)饺子(丙)丙)”。类似不当处理又如: 取“面包(甲)甲)面条(甲)甲)”而舍“面(乙)乙)”; 取“啤酒(甲)甲)”而舍“酒(甲)甲)”; 取“自行车(甲)甲)摩托车(丙)丙)出租车(甲)甲)卡车(甲)甲)公共汽车(甲)甲)”而舍“车(甲)甲)”。民以食为天, 饭是日常重要概念, 车是现代生活的基本元素, 亦属日常核心概念。在基本民生概念上, 这些不当取舍跟对“菜、茶”概念词的合理取舍南辕北辙, 难以自圆其说, 显得随意而缺乏标准, 极不合常理。

新纲对“流、眼泪”和“流泪”的不当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 “流”是 5(15/3), “眼泪”“流泪”为 0。(b)语义指标。“流”“眼泪”是基本层次概念, “流泪”不是。

前者的表达力大于后者,如前者的组合可与后者同义替换,但“流”还能跟其他液体组合,构成新的表达(如“流鼻涕|水在流”),“流泪”不能,如不说“\*鼻涕在流泪|\*水在流泪”。(c)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流(第 868 位)>眼泪(第 2732 位)>流泪(第 7099 位)”。显然应取“流”“眼泪”舍“流泪”。但新纲反倒是增收“流泪(四)”,而舍“流(甲)眼泪(乙)”。

**(3)构词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 新纲对刀概念词的恰当取舍。“刀,刀子”都是句法上的一般自由词。(a)构词指标。新纲中,“刀”构建他词的活力是 1(1/1),“刀子”为 0。(b)词频指标。“刀”的频序远前于“刀子”,比较《词表》频序:“刀(第 1991 位)>刀子(第 9979 位)”。(c)语体指标。“刀”是通用语体词,“刀子”是口语词。新纲恰当地取“刀(四甲)”而舍“刀子(乙)”。

新纲对房屋概念的不当剔除。房屋概念词有“房子、屋子、住宅”。(a)语义指标。“房子”是基本层次概念,“住宅”“屋子”都不是。“住宅”仅是居住用的“房子”,“屋子”一般表“房间”。(b)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房子(第 1440 位)>屋子(第 3136 位)>住宅(第 4032 位)”。(c)语体指标。“房子”是通用语体词,“住宅”见书面,“屋子”见口语。新纲反倒舍“房子(乙)”而取“屋子(五甲)住宅(六丙)”。

新纲对头概念词的不当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头”是 2.5(5/2),“脑袋”为 0。(b)词频指标。“头”的频序远前于“脑袋”。比较:“头(第 245 位)>脑袋(第 3244 位)”。(c)语体指标。“头”是通用语体词,“脑袋”是口语词。各指标支持取“头”而舍“脑袋”,新纲反倒舍“头(tóu, 甲)”而取“脑袋(五乙)”。

新纲对“贵、昂贵”的不当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贵”是 2.5(5/2),“昂贵”为 0,且含有仅见于本词的孤字“昂”。(b)词频指标。“贵”的词频远高于“昂贵”,比较《词表》频序:“贵(第 2251 位)>昂贵(第 10673 位)”。(c)语体指标。“贵”是通用语体词,“昂贵”偏书面。综合四项指标可见,当取“贵(二甲)”而舍“昂贵(六丁)”。但新纲两词并取,挤占了其他重要概念的教学空间,有违最简-任务型目的。

**(4)词频指标×语体指标** 新纲对“京剧-京戏,胳膊-胳臂,唠叨-叨唠”的恰当取舍。(a)语体指标。“京剧”是通用语体词,“京戏”是口语词。“胳膊,唠叨”和“胳臂,叨唠”都是口语词,但后者口语色彩更浓。(b)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京剧(第 4117 位)>京戏(第 18086 位)”“胳膊(第 4427 位)>胳臂(第 16072 位)”“唠叨(第 13583 位)>叨唠(第 28529 位)”。新纲恰当保留“京剧(四乙)胳膊(五乙)”,增收“唠叨(六)”,删其同义低频词“京戏(乙)胳臂(乙)叨唠(丁)”。

新纲对“照片-相片”的恰当取舍。(a)语体指标。“照片”是通用语体词,“相片”是老派口语词。(b)词频指标。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照片”的频率均远超“相片”,比较:“照片(11982 例次)-相片(625 例次)”。在《词表》中,“照片”的频序为第 1544 位,“相片”未收。新纲恰当保留了“照片(三乙)”,删除了“相片(乙)”。

新纲对“星期天-星期日-礼拜日-礼拜天”的不当取舍。(a)语体指标。“星期天”是通用语体词,“星期日”是书面语词,“礼拜日,礼拜天”是口语词。(b)词频指标。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星期天(2190 例次)-星期日(1495 例次)-礼拜天(200 例次)-礼拜日(98 例次)”。

比较《词表》频序：“星期天(第 9043 位)>礼拜天(第 26545 位)>礼拜日(第 45324 位)”，“星期日”未收。显应取“星期天”而舍其他。但新纲不当取“礼拜天(五乙)”而舍“星期日(甲)星期天(甲)礼拜日(乙)”。

新纲对“那里-那儿，这里-这儿，哪里-哪儿”的不当取舍。(a)语体指标。“那里，这里，哪里”是通用语体词，“那儿，这儿，哪儿”是口语词。(b)词频指标。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那里(47118 例次)-那儿(14859 例次)|这里(120300 例次)-这儿(20925 例次)|哪里(22067 例次)-哪儿(10961 例次)”。比较《词表》频序：“那里(第 667 位)-那儿(未收)|这里(第 150 位)>这儿(第 1987 位)|哪里(第 976 位)>哪儿(第 2517 位)”。新纲不恰当地取相对低频的口语词“那儿(一)甲|这儿(一)甲|哪儿(一)”而舍相对高频的通用语体词“那里(甲)这里(甲)哪里(甲)”。

**(5) 语体指标×词频指标×地域通用指标** 新纲对“聊天，面条，拐弯”及其儿化形式“聊天儿，面条儿，拐弯儿”的恰当取舍。(a)地域通用指标。过度儿化是北京话等一些北方方言的地域特征。“聊天，面条，拐弯”是共同语词，其相应的儿化形式是地域用词。(b)语体指标。“聊天，面条，拐弯”是通用语体词，其相应儿化形式是口语词。(c)词频指标。《词表》收“聊天，面条，拐弯”，其频序分别为第 6271 位、第 11121 位、第 18795 位，儿化形式未收。新纲恰当地增“面条(三)聊天(四)拐弯(五)”，删其儿化形式“面条儿(甲)聊天儿(乙)拐弯儿(丙)”。

新纲对“使劲-使劲儿”的不当取舍。(a)地域通用指标。“使劲”是共同语词，“使劲儿”带北方方言色彩。(b)语体指标。“使劲”是通用语体词，“使劲儿”口语词。(c)词频指标。两种词形频率相差大，比较《词表》频序：“使劲(第 7255 位)>使劲儿(第 9190 位)”。新纲不当增收“使劲儿(五)”而删“使劲(丙)”。

### 3.2 言内指标和言外指标的兼容

言内指标也可与言外指标协同作用，决定词项取舍。

**(6) 词频指标<sub>言内</sub>×现实指标<sub>言外</sub>** 新纲对近义词“签字-签名”的恰当取舍。(a)词频指标。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签字(4575 例)”显超“签名(2492 例)”。再比较《词表》频序：“签字(第 4615 位)>签名(第 6260 位)”。(b)现实指标。日常正式手续常需经过签字程序，表批准义的“签字”不大说“签名”。纪念性的“签名”也不能换说成“签字”，但征求纪念性签名的人不多。所以“签字”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大于“签名”。新纲恰当保留“签字(五丁)”，删其近义词“签名(丁)”。

新纲对节日节日活动概念词的不当取舍。(a)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春节(第 1943 位)新年(第 4314 位)过年(第 4411 位)”和“元旦(第 6462 位)除夕(第 10692 位)国庆节(第 12285 位)元宵节(第 21655 位)重阳节(第 32099 位)拜年(第 9360 位)”，前者频率远较后者高，且居前 5000 词以内(新纲收词规模是 5000 词)。(b)现实指标。前者代表中国最重要的全民传统节日及其活动，后者代表的重要性稍次，甚或是非全民的。恰当的做法是优先取前一组词，但新纲的做法正好相反，不当删除“春节(乙)新年(甲)过年(乙)”，反倒保留了“元旦(五丙)除夕(五丁)元宵节(六)端午节(六)重阳节(六)国庆节



(五丙)拜年(六丁)”。

(7)(词频指标×构词指标)<sub>言内</sub>×社会规约<sub>言外</sub> 新纲对“作主、做主”的恰当取舍。“作、做”单独当词用时，呈文白区分。“做”有口语色彩，“作”有书面色彩。但这对其凝定的复合词来说，并无参考价值，就像“作文”不能擅改为“做文”一样。(a)频率指标。在 CCL 语料库的搜索结果中，“作主”远超“做主”(见表 1)，熟语中的分布悬殊更大，比较“当家作主(1135 例次)-当家做主(227 例次)”。(b)构词指标。从历时看，“作主”先有，首现于南北朝(如颜延年诗“亘地称皇，罄天作主”)，一直延续至今，清代如蔡衍篔诗“驿从唐置已成墟，此日名山谁作主”，“做主”则首现于宋代，如[宋]杨时《龟山集》云“故凡事疑有后害于民所未到者，当与他做主”，自宋时始，“做主”与“作主”混用至今。《中国基本古籍库》的分布数据(见表 1)表明，“作主”历代都比“做主”强势。

表 1 “作主-做主”势力对比统计表

	现代汉语	唐	宋	元	明	清
作主	1890	374	1083	338	1478	4450
做主	867	0	68	62	712	361

另一相关熟语“自作主张”古代也与“自做主张”混用，但同样是前者强势，如[宋]孙梦观《雪窗集》“心君志帅，自作主张”，[宋]龚昱《乐菴语录》“注之学有利有害，须是自做主张方可”，《中国基本古籍库》记录条目数“自作主张(45 例次)-自做主张(18 例次)”。(c)社会规约。成语“自作主张”已形成规范，非“自做主张”。根据互参，凝固程度更高的合成词有理由接受类似规范方案的约束。综合考虑，大纲宜取“作主”而舍“做主”。旧纲合理采取了该方案”，但新纲反而增“做主(六)”而删“作主(丁)”，显属不妥。

将所有 7 种兼容模式归为表 2 发现，频率指标是共有项和必有项，其他指标表现出选择性，表明频率是兼容模式的最基本指标。这符合学界对频率指标居首要地位的一般认识。

表 2 兼容模式指标势力比较表

兼容模式	言内指标					言外指标
	构词指标	语义指标	词频指标	语体指标		
1	构词指标	语义指标	词频指标	语体指标		
2	构词指标	语义指标	词频指标			
3	构词指标		词频指标	语体指标		
4			词频指标	语体指标		
5			词频指标	语体指标	地域通用指标	
6			词频指标			现实指标
7	构词指标		词频指标			社会规约

#### 4. 多项指标的冲突

多项指标间有时存在冲突。冲突时双方有你无我，容不得妥协，只得多方权衡，在它们间作出抉择。因此冲突模式的操作策略明显不同于兼容模式。新纲对设计标准

的系统性和动态作用准则缺乏足够认识,因而缺乏统一、合理的操作原则,导致前后矛盾,难以一贯,随意性大。

显然,即便是冲突模式,也仍然不能偏离大纲设定的目标。冲突模式分两级,一是言内指标的冲突,二是言内外指标的冲突。

#### 4.1 多项言内指标的冲突

冲突情况下的处理策略有胜负模式和轮替模式两种。

**4.1.1 胜负模式** 胜负模式是竞争关系下的一次性处理模式,胜者入选,败者淘汰。冲突双方等候抉择时,在逻辑上是析取关系(“或”),用/表示。用 $\Rightarrow$ 右侧表冲突情况下的选择方案。

**(1)(构词指标 $\times$ 词频指标 $\times$ 语义指标)/(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Rightarrow$ 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构词、词频、语义的协同指标跟句法、语体的协同指标冲突时,后者获胜。新纲对“园(丁)”的恰当淘汰。(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园”为 4(4/1),“公园,花园,幼儿园,园林”为 0。(b)语义指标。“园”可泛义替换后四词:“{公园内,花园内,幼儿园内,园林内} $\rightarrow$ 园内”。反之不然。(c)词频指标。“园”频序居首,比较《词表》频序:“园(第 1970 位) $>$ 公园(第 2176 位) $>$ 花园(第 4246 位) $>$ 园林(第 5950 位) $>$ 幼儿园(第 6319 位)”。(d)句法指标。“园”是有限自由词,句法上通常用在单音节方位词前,如“~中游人很多”。后四词都是一般自由词。(e)语体指标。“园”有较强书面色彩,“公园、花园、幼儿园、园林”是通用语体词。指标 a-c 支持对“园”的吸收,指标 d-e 支持对“园”的淘汰,因而存在冲突,新纲恰当遵从指标 d-e,保留后四词,删除了“园(丁)”。类此,新纲合理删除了“馆(甲)”。

**(2)(构词指标 $\times$ 词频指标)/(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Rightarrow$ 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构词、词频协同指标跟句法、语体协同指标冲突时,后者获胜。新纲对“盒,盒子”的恰当取舍。“盒,盒子”可同义替用,秉持最简-任务型精神,需对之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盒”为 1(1/1),“盒子”为 0。(b)词频指标。“盒”的频序前于“盒子”,比较《词表》频序:“盒(第 4934 位) $>$ 盒子(第 9348 位)”。但:(c)句法指标。“盒子”是一般自由词,“盒”是有限自由词。(d)语体指标。“盒子”是通用语体词,“盒”是书面词。指标 a-b 和指标 c-d 形成冲突。两相权衡,新纲遵从指标 c-d,恰当取“盒子(四)”,而舍“盒(乙)”。

**(3)词频指标/(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Rightarrow$ 句法指标 $\times$ 语体指标** 词频指标跟句法、语体协同指标冲突时,后者获胜。新纲对“案、案件、案子”的恰当取舍。三词可同义替用,秉持最简-任务型精神,需对之取舍。新纲构词活力中,“案”为 3.5(7/2),“案件、案子”虽为 0,但“案件”的“件”为 12(12/1),“案子”的“子”为常见后缀,综合看,三词在该指标上无明显区别。(a)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案(第 1109 位) $>$ 案件(第 1461 位) $>$ 案子(第 6523 位)”。(b)句法指标。“案”的句法自由度低于“案件、案子”,前者常用于单音节方位词前或单音节代词、量词后,如“与本~无关|~中的关键人物|大学生被打一~”。(c)语体指标。“案件”为通用语体词,“案子”为口语词,“案”为书面词。指标 a 和指标 b-c 形成冲突。两相权衡,新纲遵从指标 b-c,恰当吸收“案件(丙丁)”,删除旧

纲的“案(丁)”,也不增收口语词“案子”。

新纲对“骨头、骨”的恰当取舍。“骨头、骨”可同义替用,秉持最简-任务型精神,需对之取舍。新纲构词活力中,“骨”为 1(2/2),“骨头”的“头”为常见后缀,两词在构词指标上无明显优势差异。(a)词频指标。“骨”的词频远高于“骨头”。比较《词表》频序:“骨(第 2916 位)>骨头(第 6671 位)”。(b)句法指标。“骨”的句法自由度低于“骨头”,前者仅用于固定短语(如“~瘦如柴|钢筋铁~”)或单音节名词后(如“牛~”)。(c)语体指标。“骨头”为通用语体词,“骨”为书面词。指标 a 和指标 b-c 形成冲突。两相权衡,新纲遵从指标 b-c,恰当吸收“骨头(五乙)”,删除了旧纲的“骨(丁)”。

**(4)词频指标/语体指标⇒语体指标** 当词频指标和语体指标发生冲突时,并非如一般认识优先遵从词频指标,需视情形作出两种不同的因应。

若候选词之间表现为通用语体色彩和书面/口语色彩的差异,则遵从语体指标。如新纲对“肩膀、肩”的恰当取舍。新纲构词活力中,“肩”为 1(1/1),“肩膀”为 0,且含仅见于本词的孤字“肩”,但“肩膀”的“膀”为 2(2/1)。可见,“肩膀、肩”在该指标上没有明显差异。(a)词频指标。“肩”的词频大于“肩膀”。比较《词表》频序:肩(第 4270 位)>肩膀(第 4975 位)。(b)语体指标。“肩膀”是通用语体词,“肩”偏于书面。指标 a 和指标 b 存在冲突,前者支持取“肩”舍“肩膀”,后者支持取“肩膀”舍“肩”。两相权衡,新纲遵从指标 b,恰当吸收“肩膀(五丁)”,删除了旧纲的“肩(乙)”。

但是,若候选同义词的语体色彩差异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则该差异可跟词频指标上的差异形成对冲,遵从哪一指标好像都有道理。如新纲对早晨概念词的取舍。(a)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早晨(第 2892 位)>早上(第 3988 位)”,频率悬殊很大。(b)语体指标。“早上”是口语词,“早晨”是书面词。两指标发生冲突,新纲保留口语词“早上(二甲)”,删同义的书面词“早晨(甲)”。又如新纲对“吸烟-抽烟”的取舍。(a)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吸烟(第 7018 位)>抽烟(第 7615 位)”。(b)语体指标。“吸烟”是书面词,“抽烟”是口语词。新纲保留“抽烟(四乙)”而舍“吸烟(乙)”。从新纲设定的目标看,它们不无道理,但若反向处理,即取“早晨”而舍“早上”,取“吸烟”而舍“抽烟”,似乎也能接受。

**(5)(构词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语体指标** 构词、词频的协同指标跟语体指标冲突时,后者获胜。新纲对“时候、时”的恰当取舍。“时、时候”可同义替用,秉持最简精神,需对之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时”为 6.5(26/4),“时候”为 0。(b)词频指标。“时”的频序远高于“时候”,比较《词表》频序:“时(第 33 位)>时候(第 180 位)”。(c)语体指标。“时”仅用于书面,“时候”泛用于一般语体。句法上的有限自由词必然在语体分布上受到限制,反之则不然,句法自由度较高的书面词“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指标 a-b 和指标 c 存在冲突,前者支持取“时”舍“时候”,后者支持取“时候”舍“时”。两相权衡,新纲遵从指标 c,恰当取“时候(一甲)”而舍旧纲“时(丁)”。

**(6)构词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句法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句法指标** 构词指标跟词频、语体、句法协同指标冲突时,后者获胜。新纲对“眼睛、眼”的恰当

取舍。“眼睛、眼”可互相同义替用，在最简-任务型目的下应取其一。(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眼”为4.5(9/2)，“眼睛”为0，且含仅见于本词的孤字“睛”。(b)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眼睛(第846位)>眼(第896位)”。(c)语体指标。“眼睛”是通用语体词，“眼”是书面词。(d)句法指标。“眼睛”是一般自由词，“眼”是有限自由词。指标a和指标b-d存在冲突，两相权衡，新纲遵从后者，恰当吸收“眼睛(ㄟ甲)”，删除了旧纲的“眼(乙)”。

**(7)构词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词频指标×语体指标** 新纲对“眼泪、泪”的不当取舍。(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泪”为3，“眼泪”为0。(b)词频指标。比较《词表》频序：“眼泪(第2732位)>泪(第3099位)”。(c)语体指标。“眼泪”是通用语体词，“泪”是书面词。指标a和指标b-c存在冲突，两相权衡，应遵从后者，取“眼泪”而舍“泪”，但新纲不当悉数舍除，造成概念空缺。

**4.1.2 轮替模式** 轮替模式是多个胜负模式的连环。它比胜负模式更复杂，因此不太常见。以两个有序集合的映射关系 $(x, y) \Rightarrow (a, b)$ 表示：先有x环节的操作，得结果a；后有y环节的操作，得结果b。

**(8)((构词指标×语义指标)/(句法指标×语体指标×词频指标)，构词指标/语义指标)⇒(句法指标×语体指标×词频指标，语义指标)** 它包含两个连续的胜负模式。先发的胜负模式是8a，即：构词、语义的协同指标，跟句法、语体、词频的协同指标冲突，后者在竞争中获胜。继发的胜负模式是8b，即：构词指标跟语义指标冲突，语义指标获胜。

8a.(构词指标×语义指标)/(句法指标×语体指标×词频指标)⇒句法指标×语体指标×词频指标

8b.构词指标×语义指标⇒语义指标

以新纲对“伴、伙伴、同伴、伴侣”的取舍为例。(a)构词指标。新纲构词活力中，“伴”为1.5(3/2)，其他三词为0，“伴侣”含仅见于本词的孤字“侣”，但“伙伴”的“伙”为2.5(5/2)。(b)语义指标。“伙伴、同伴、伴侣”都可泛义换说成“伴”，反之不然。“伙伴”“同伴”意义范围相当，但后者还只指旅行伙伴。“伴侣”只指婚恋关系，不大能同义替用为“伙伴”。但：(c)句法指标。名词“伴”为有限自由词，其他三词为一般自由词。(d)词频指标。“伙伴”频率最高，比较《词表》频序：“伙伴(第2438位)>伴(第5204位)>同伴(第8391位)>伴侣(第14953位)”。(e)语体指标。“伙伴、同伴”为通用语体词；名词“伴”在口语里常儿化，儿化时北方味儿较浓；“伴侣”为书面词。

新纲第1步，经构词、语义的协同指标跟句法、语体、词频的协同指标竞争，遵从后者，恰当取“伙伴(ㄟ丙)”舍“伴(丁)、同伴(丙)”。第2步，经构词指标和语义指标的竞争，遵从后者，即基于语义的特殊性，补取“伴侣(ㄟ丁)”。不过，“伴侣”的频序远在新纲收词总规模的近三倍之外，是否应吸收入纲，尚值得商榷。

在言内指标的上述所有冲突模式基础上，可求得各指标的胜出率，见表3。由表3可见，冲突模式中，语体、句法指标是强势指标，其胜出率都是100%，在胜出的兼容指标中其共现率高达83%(5/6)。词频指标退居弱势地位，它常为败方，仅在跟语体、

句法这两个强势指标协同作用时,才得以胜出。学界一般认为,频率指标是大纲择词时的首要依据。赵金铭等(2003)明言:“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其性质决定了其编制必须以词语的使用频度为原则,用使用频度来衡量词语的常用程度,以进行词语筛选和确定词语的等级。”马清华(2008)分析了旧纲唯频率标准的偏颇,证明频率标准并不自足,但仍认为频率标准最为重要。此处的结论颠覆了关于频率居绝对首要地位的认识。频率的首要地位实际仅局限于系统指标的兼容模式即常规范围内(参 §3)。此类冲突模式中,语义、构词指标也是弱势指标,但语义指标可在单独跟构词指标竞争时胜出,表明构词指标最为弱势。

表 3 言内指标冲突模式的指标胜出率对比表

	构词指标	词频指标	语义指标	句法指标	语体指标
胜出模式数/参与竞争模式数	0/7	3/8	1/3	5/5	8/8
胜出率	0.00%	37.50%	33.33%	100.00%	100.00%

#### 4.2 言内和言外指标的冲突

言内指标与言外指标冲突时,其处理策略均为胜负模式。

(1)词频指标<sub>言内</sub>/(现实指标<sub>言外</sub>×语义指标<sub>言内</sub>)⇒现实指标<sub>言外</sub>×语义指标<sub>言内</sub> 新纲对排泄物词和排泄处所词的恰当取舍。(a)词频指标。排泄物词的频率并不都低于排泄处所词。比较《词表》频序:

【排泄物】粪(第 6990 位)>屁(第 7451 位)>屎(第 7687 位)>尿(第 9501 位)>大便(第 21472 位)>小便(第 21929 位)【排泄处所】厕所(第 4486 位)>卫生间(第 10435 位)>洗手间(第 24728 位)

(b)现实指标。现实关注的重要概念在大纲中应得到吸收。尽管排泄物属低级趣味词,不需过度聚焦,但排泄是吃喝拉撒中的拉撒,属日常重要概念,如户外活动内急时必须尽可能快速问询到卫生间。若全然删除表排泄物和排泄处所的词,造成语义空缺,则无法满足日常生活的表达需要。(c)语义指标。掌握了排泄处所词,等于解决了绝大部分相关表达的需要,而掌握多个同义的排泄处所词,更可提升顺利找到目标的几率。故此,新纲删除了旧纲中所有排泄物词“大便(丙)粪(丙)屎(丁)小便(丙)尿(丁)屁(丁)”,却不仅保留“厕所(㉔乙)”一词,甚至还扩增了它的同义词“洗手间(㉔)卫生间(㉔)”。

(2)词频指标<sub>言内</sub>/社会规约<sub>言外</sub>⇒社会规约<sub>言外</sub> 新纲对“桔子-橘子”的不当取舍。(a)词频指标。CCL 语料库搜索结果是“桔子”略超“橘子”,比较:“桔子(392 例次)-橘子(209 例次)”。(b)社会规约。第一、二批《异形词整理表》均未作取舍,但汉语母语教学方案(如人教版、苏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生字表)中,均有“橘”,无“桔”。《词表》中,“橘子”频序第 13126 位,“桔子”也未收。在最简-任务型目的下应取其一,不能像旧纲那样“桔子,橘子”并收。若二者择一,似当参照母语教学方案,取“橘子”而不取“桔子”,但新纲不恰当地取“桔子(㉔甲)”而舍“橘子(甲)”。

以上 2 条胜负模式表明:当言内指标和言外指标发生冲突时,往往是言外指标所在的一方获胜,这印证了语言的工具性本质,即语言不可能凌驾于它的使用目的。频率

在竞争中的落败，也再次证明它在冲突模式中的弱势地位。

##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新 HSK 词汇大纲的得失分析和评价，并基于系统运筹观加以归纳论证，表明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大纲设计时，任务目标、指标条件、处理策略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众指标特征间的互动关系，抽象出一般原理和总体规律，发现第二语言教学词汇大纲的设计指标是系统性、多层面、多项目的，多项指标在动态中发挥作用，有兼容和冲突两种模式。频率这个一般认识上最基本的指标，其首要、强势地位其实只存在于指标的兼容模式。在指标的冲突模式里，并非如此。冲突模式可分两级，首先是言内指标的冲突模式，语体指标、句法指标是其强势指标，两者常协同作用，词频指标退居弱势，构词指标最为弱势；其次是言内外指标的冲突模式，在该模式中，言外指标是强势指标，言内指标退居弱势，表明语言不可能凌驾于它的使用目的。不管哪种模式，指标的所有互动和优选活动，都受制于高能优先原则。结论推翻了第二语言学界关于频率地位居首的惯常认识。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对保证汉语国际教育词汇大纲的设计质量，完善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在内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有一定意义。

## 参考文献：

- 陈满华. 1995. 俞敏语言学论著的语言风格[J]. 修辞学习, 4: 18-19.
-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10.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拉波夫, W. 1979. 在社会环境里研究语言[A]. 中译, 语言学译丛(第一辑)[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清华. 1999.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词汇量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50-59.
- 刘长征. 2007. 《词汇大纲》与 2005 媒体高频词语比较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研版), 3: 14-19.
- 马清华. 2000. 文化语义学[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_\_\_\_\_. 2008. 唯频率标准的不自足性——论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词汇大纲设计标准[J]. 世界汉语教学, 2: 119-134.
- \_\_\_\_\_. 2010. 汉语水平考试 HSK 词汇分类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 2008.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张凯. 1997. 汉语构词基本字的统计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43-52.
- 赵金铭、张博、程娟. 2003. 关于修订《(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的若干意见[J]. 世界汉语教学, 3: 73-83.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02.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S].
- 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国家语委异形词研究课题组等. 2003. 第二批异形词(264组)整理表(草案)[S].

## The Non-absoluteness of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Frequency

—On the Vocabulary Design Criteria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Ma Qinghua \*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design criteria of the vocabulary outline of th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vary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Under the same objective, the criteria are often more than one. The multiple criteria are sometimes compatible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Through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new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Vocabulary Outlin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ask objectives, the criterion conditions and process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ultiple criteria features of the vocabulary outline designing process, and then abstract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overall rul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bvert the habitual knowledge that the frequency criterion position ranked first, which is always popular at least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It finds that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frequency criterion only exists in the criteria compatibility model. In the conflict model of the locutionary criteria, the stylistic criterion and syntactic criterion are strong criteria, while the word frequency criterion relegates to the weak position. In the conflict model of the locutionary and illocutionary criteria, the illocutionary criterion is strong criterion, while the locutionary criterion relegates to the weak posi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language can't be above its purpose of usage. This resear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ocabulary outline. It also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isciplinary theories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 or even to the whol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vocabulary outline, design criteria, compatibility, conflicts, dynamic action principle, optimization

---

\* Dr. Ma Qinghua: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Research Direction: Semantics and Syntax.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Linguistic Problems under the System Principl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2); *Semantic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Beijing: Language Press, 2006); *On Self-Organization of Coordinate Structur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ultural Semantic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ress, 2000); *Polysynthetic Language: The Extreme of morphologic complexi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Syntactic and Semantic Study*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2001) and so on. E-mail: maqh86@nju.edu.cn.